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丝绸

沈福伟 著

中国与非洲文化交流研究

之路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丝绸之路

中国与非洲文化交流研究

沈福伟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 屹

副 主 任 祝 谦 石永强

编 委 陈重秋 周菁葆 苗普生

沈福伟 张国刚

主 编 张新泰 李维青

主 编 张 田(执行)

策划编辑 张 田 李春华 罗 沛

英文翻译 崔延虎

整体创意 张新泰

装帧设计 王 洋



出版说明

形成于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是一条“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①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为我们揭示出东西方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纵观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它不仅凝结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而且汲取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精神文化成果。可以说,“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高度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古代中华文明”。^②

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图书——《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的出版,不仅为国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10年过去了,伴随着丝绸之路考古的新发现和丝绸之路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为了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在丝

① 林梅村著:《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 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32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绸之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2008年年初,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重新编辑出版《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新版《丝绸之路研究丛书》除了保留原有的几种选题之外,又从中国已出版或待出版的研究成果中,遴选了20余种有代表性的选题列入丛书,计划分批推出,陆续出版。这批研究成果,以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为主线,以西域研究为重点,注重突出学术著作的创新性和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内容涉及考古、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等多学科领域。由于入选的研究成果在出版时间上跨度较大,此次再版前均由作者对书稿内容做了全面修订,有的甚至做了重大修改,补充了新的资料,借鉴了新的研究成果和观点。

为了使读者了解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进展情况,我们特邀请中西文化交流史著名学者、苏州大学教授沈福伟先生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先生为丛书撰写了序言。文中的精辟论述和真知灼见,是读者开启《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的一把钥匙。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自始至终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的关心和支持。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对丛书选题的书稿进行了学术评审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从而保证了丛书的学术质量。由于编者学术水平所限,丛书在编辑中难免挂一漏万,有所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年12月6日



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学研究

(总序一)

丝绸之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

丝绸之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丝绸之路概念最早是19世纪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的欧洲探险家提出来的。在当时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西部地区在古代曾经呈现过的多元文化的一种重新发现,也可以说是历史上这些由多民族创造的文化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得的认同。它之所以产生在中国社会处于大转折的时期,是具有深层次原因的。19世纪中叶,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从此进入了丧权辱国、危机四伏的国难时期。英、俄等欧洲列强首先对中国西部边疆实行蚕食政策,掀起了一股以地理考察为名的探险热。当时走在这股热潮前列的是德国巴登—符腾堡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68年李希霍芬接受了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第二次到中国考察,到达上海后受英国商会委托,对中国地貌和地理首次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综合考察,足迹遍及当时18个省中的15个省,还到了东北(满洲),摸清了中国的资源和开发的前景。1872年返回德国后,李希霍芬出任柏林大学校长,当选为国际地理学会会长,致力于写作5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s 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1877~1912年, 5vols.),到去世前出版了1、2两卷。他从亲身的考

察和得到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古代在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的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由此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足以令后世赞叹和瞻仰的遗迹和文物。

李希霍芬的偶然发现,在以后半个世纪中竟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这和中国领土受到西方列强的蚕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受到李希霍芬的影响,他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追踪他的足迹,先后7次到中亚和中国西部进行地理考察和考古发掘。差不多同时,俄国人尼古拉·普尔热瓦斯基(Nicholas Przwevsky)和奥勃鲁契夫(Obrochev)、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 Stein)、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勒柯克(Le Coq),先后率领探险队,在世纪之交进入中国新疆和西部地区。他们在楼兰古址进行田野发掘,堂而皇之拿走了新疆石窟寺院中的彩塑佛像,将尘封已久的吐鲁番盆地的古物成箱运出中国国境。他们还设法进入了敦煌石窟的藏经洞,攫取了前所未闻的精美壁画、塑像、铭记、经卷和丝织品。原先保存在石窟寺和遗址中数以万计的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从此流失海外,成了伦敦、巴黎、柏林、新德里和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也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莱比锡)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论证。后来赫尔曼在他编著的《中国历史商业地图》(哈佛燕京学社,1935)一书中加以宣扬,从而使丝绸之路为世人所熟知。

平心而论,丝绸之路原本只是对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历史毫无所知的欧洲人,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了解到的。当时已经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地区在千百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且在古代亚洲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之间,由于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自从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之后,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腓尼基人航抵山东”、“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中国青铜工艺西来”的学说接踵而来,似乎无论哪一样新发现、新材料都在显示中国文明的根在西方。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当时欧洲人设计的西方文明框架,是以地中海世界为主体的一大文化圈,将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的古文明一一囊括入内,并称其为“中东”,剩下的东亚(欧洲人称为“远东”)和中亚(欧洲人称为“突厥斯坦”),无非是西方文明东扩的支脉而已。可见在国家丧失主权以后,学术无法自主的情况下,文化的研究、历史的阐释要取得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

的大问题。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自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多世纪中,前50年走的正是在“欧洲中心论”框架下对历史潮流的歪曲和误解,所以在阐释东亚文明的形成过程时出现了以上各种各样的,从人种到文化全都来自西方的说法。尔后50年,不仅仅是由于丝绸之路学自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更多的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得力于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考察,有了重大的进展。由于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经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这样的研究,是在中国学术界取得自主权的同时才开始的。这样的研究一旦启动,在当时便具有了国际合作的特点,迎来了丝绸之路学研究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先前已五次来华进行地理考察与探险活动,在国际上声名显赫的斯文·赫定,会同在中国政府部门工作的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德日进等中外科学家共同发起的。由于这样的共识,1927年经过南京政府核准,在北京由中国和瑞典双方合作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科学考察团由徐炳昶任中方团长,斯文·赫定担任瑞典团长,从北京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经过河套、宁夏,奔赴新疆哈密、吐鲁番,抵达乌鲁木齐。1930年10月科学考察团调整阵容后,扩大到调查楼兰古道和罗布泊,测绘塔里木盆地,考察甘肃古迹和戈壁沙漠,还到内蒙古进行民族学调查,去川藏边境考察动植物。考察工作在1935年告一段落,作为总结,斯文·赫定在同一年用英文出版了《丝绸之路》一书。科学考察团搜集到大批的资料、标本、简牍、石刻、壁画和各种古文字的文书以及丝织品,第一次实现了在中国政府监管下对丝绸之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善加保管,为中国学术界建立丝绸之路学,给今后以中国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开展多元文化研究,构筑了中外科学家相互交流的平台。

丝绸之路学研究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进入第二个高潮。在1959~1975年间,新疆博物馆和吐鲁番文物管理所牵头,对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系统的发掘,获得了上万件极具社会与文化价值的文书,在1992年出版了10卷本《吐鲁番文书》的释文。在这段时间里,卷帙浩繁的敦煌学已从丝绸之路学的分支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1983年8月成立的敦煌吐鲁番学会,标志着自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到丝绸之路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已经走过了最初的100年。其中最后的50年,经过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奋进,终于扭转了“丝绸之路在中国,丝绸之路学中心在西方”的那种令中国人陷入丧失民族自尊的窘境。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就是中国学者在丝绸之路学这一研究领域所推出的部分成果。

丝绸生产技术在6000年前人类文明史中极具工艺价值的一项伟大发明,它诞生在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

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根据考古发现,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交流大约进行了2000年之后,像波斯、拜占庭这样的文明古国,才从中国学到了从养蚕、缫丝到纺纱、织锦的全部工艺流程。因此,丝绸之路提出的的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丝绸之路学的研究,也必然是一项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取得丰硕成果的研究。这算是我在这套丛书出版时的一点感想,写出来供各位专家学者探讨。

沈福伟

2010年11月10日于苏州大学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总序二)

欧亚大陆上不同区域的人群在史前时期就有往来迁徙活动，高加索人种至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中国文明在其诞生之始就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在当时条件的许可之下参与各种文明的交换与交流。中国境内不同地区文明的融合以及华夏文明与异域文明的交流，对于塑造中国文明的基本面貌都有重要作用。

文献记载表明，先秦时期的黄河流域就与葱岭以西地区有较牢固的联系，而遥远的古希腊也具有对远东地区的模糊认识。昆仑山玉石的东输对于中原玉文化的兴盛有非凡作用，斯基泰人的东迁南下对于中亚和南亚的人种与文明有着深刻影响，两者更表明中原与西方的交通道路在远古时期便实际存在。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就在今天阿富汗市场上发现了绕道印度而来的中国四川地区的纺织品和竹木制品。可见，汉代中国政府开辟丝绸之路和经营西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远古交通道路的重新认识和拓展，但更重要的意义是中原地区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外部世界并延伸本土文化的活动空间。此后各朝政府都延续了这种对外交往的传统，并于唐代达到顶峰，从而形成了地中海地区、阿拉伯地区以及波斯、中亚、南亚、东亚往来互通的交流格局。西方各地区的文化汇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更新的重要动力，中国的特产渐次西传，在很多方面影响了西方诸地的生活习惯。元代的欧亚大陆交通达到空前畅通，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创造了良好条件。

丝织品名副其实为中国的独特创造。考古工作者在浙江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和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都发现了丝织物,意味着中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蚕丝织物的生产。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则与丝绸有密切的关系,以致后世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交流通道统称为丝绸之路,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的产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春秋战国之际,东西方之间已经沿着如今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欧亚大陆交通路线开展丝绸贸易。被认为写于公元前5世纪阿契门尼德王朝统治下的波斯(The Achaemenid Empire of Persia)的《旧约·以西结书》(Ezekiel, 16:10; 16:13)有一段提到耶和华要为耶路撒冷城(Jerusalem)披上最美丽最豪华的衣裳。耶和华在形容世间最美丽的织物时两次提到“丝绸”。这意味着此时的波斯帝国内已有中国丝绸。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和色诺芬(Xenophon)也说波斯人喜爱米底亚(Medea)式的宽大上衣,而此种衣物的材料正是后来被希腊人称为“赛里斯”(Seres)的中国丝绸。这种轻薄衣料的来历令希腊人浮想联翩,如猜疑出产于羊毛树上,或推测得之于蜘蛛腹中。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同一时期丝绸也已传至欧洲,因为所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希腊雕刻和彩绘人像所穿衣服都极为稀薄透明,似为丝绸面料。汉唐时期,丝绸不仅是北方陆路交通线上的主要贸易品,也是中国政府赐赠西方国家的主要礼品。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文化交流在丝绸还未成为主要贸易商品之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存在。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的出现正是这种交流存在的具体表现,它们可谓丝绸之路的前身。草原之路通常是指始于中国北方,经蒙古高原逾阿尔泰山脉(Altay)、准噶尔盆地进入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的通道。这是古代游牧民族经常迁徙往来的通道,来自东欧的印欧语系民族斯基泰人,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就是沿此通道由西而东并南下印度或东南行至阿勒泰地区。绿洲之路是指位于草原之路南部,由分布于大片沙漠、戈壁之中的绿洲城邦国家开拓出的,连接各个绿洲的一段段道路和可以通过高山峻岭的一个个山口道路。这条通道逐渐成为欧亚大陆间东西往来的交通干线。据说周穆王西巡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虽说穆天子的故事未必真实,但考古发现已将这条道路的出现时间追溯到远早于周穆王的时期。尽管自中原通往中亚以及西亚、南亚、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作为中西方的贸易通道在很早以前就已自然地存在,但其真正的辉煌与繁荣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体现,则始于汉唐时期。从此,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同时中国也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世界。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正式拉开。

说道中西文化交流,还不能不强调西域。

西域是一个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的历史地理概念。所谓西域,通常是对阳关、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的统称,但这一概念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并且不

同历史时期的西域所指的地理范围也不尽相同。

汉代的西域,狭义上是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即后来西域都护府统领之地,按《汉书·西域传》所载,大致相当于今天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广义上的西域则除以上地区外,还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乃至更西的地区,事实上指当时人们所知的整个西方世界。与唐代的西域概念相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西域是一个范围不断变动的地理区间。随着唐王朝势力向中亚、西亚的扩展,汉代的西域变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辖控之地,并因推行郡县制度、采取同中原一致的管理政策而几乎已成为唐王朝的“内地”。西域则被用来指安西和北庭以远的、唐王朝设立羁縻府州的地区,具体而言就是中亚的河中地区以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亚、南亚地区。但西域的政治军事功能与汉朝相同,都是作为“内地”的屏藩,并且在两汉与匈奴的斗争、唐朝与阿拉伯人的斗争过程中,各自的西域地区也确实起到了政治缓冲作用。唐朝广义的西域概念也比汉朝有所扩大,随着当时对西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而在汉朝广义西域概念的基础上继续扩展至地中海沿岸地区。

丝绸之路研究所讲的西域,指的就是两汉时期狭义上的西域概念。该地区在两汉时期是多种族、多语言的不同部族聚居之地,两汉政府并未改变该地区的政治结构,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其作为中原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屏障。从地理位置看,狭义西域即塔里木盆地正处于亚洲中部,英国学者斯坦因(M.A. Stein)将其称为“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可以说是非常形象。它四面环山,地球上几大文明区域在此发生碰撞。不过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并未使其与周围世界隔离,一些翻越高山的通道使它既保持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又得以利用自然的优势免遭彻底同化。上述地理特征也造就了西域地区作为世界文明交汇点的文化特征,波斯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在这里汇聚。而在充分吸收这些文明的同时,西域并没有被这些文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形成适合本地区的多元文化。在这里可以找到众多古代文化的影子,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西域文化的个性张扬,这正是西域文化的魅力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西域并不同于西方。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是一个特别具有异国情调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方位名词,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就地域而言,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随着历史步伐的演进而转移,大致在明朝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方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与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然而中国人观念中的西方在文化上始终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异域文化。对于西方世界(绝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异域外邦的意识,西方从来都是一块代表非我族类之外来文化的神秘地方。

用现代概念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有一个东亚世界和西方世界(绝域)的观念。东亚世界笼罩在中国文化圈之内,是中国人“天下”观的主要内容。在东亚世界

里,古代中国的国家政策以追求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为满足。对于东亚世界的成员,只要接受中华礼仪文化,就可以被纳入朝贡国的地位,否则就有可能兵戎相见。因为古代国家的安全观,乃是以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同与异来确定,文化上的认同是界定国家安全与否的关键因素。这样看来,西域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观念中既可视作“天下”的边缘地区,又可视作“天下”与“绝域”的中间地带。这也正是西域的独特性所在。

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我看了丛书选目录及其作者,大都是能体现丝绸之路研究学术特色的上乘之作。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能够看到即将有如此众多的成果问世,由衷感到高兴,应约写下如上文字,权当为序。

张国刚

2010年11月23日于北京清华园



前言

非洲这块古老的大陆,实际上是和亚洲大陆连接在一起的,狭长的红海并未能切断亚非大陆在三角形的西奈半岛所构成的陆梁。从亚洲的角度看来,非洲和欧洲一样,不过是亚洲大陆向西均匀的伸展,是被称为旧世界的亚、非、欧三大洲的一个匀称的组成部分。

非洲大陆从地形上看,像一片桑叶静静地躺在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已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它确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这个发源地近在印度洋的西岸,和亚洲西南部的古文明发祥地十分接近。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非洲曾被描绘成林莽丛生、野兽出没、沙漠连片、炽热逼人的地方。在一些西方人士的笔下,好像只有从那些肤色暂白,携带了新式火器,驾驶着快速的三角帆船的欧洲人来到非洲沿岸以后,非洲才重新成为世界的一员。直至 20 世纪,他们还公开宣称,非洲的开发是“白种人的负担”!

然而非洲却是最早使用铜器和铁器的地区。非洲人,无论他们是肤色洁白的闪族,还是混血的含族,或者在热带非洲土生土长的苏丹和班图民族,以至比他们历史更加悠久的一些黑肤色民族,都有过值得称道的颇具壮观的辉煌文明。这些文明有些早已湮没无闻,有些仍在繁衍发扬。今天,它们都在逐渐从久埋的地下发掘出来,重新得到认识。

非洲曾经被认识,又曾经被遗忘。已经认识的需要永久流存,业经遗忘的必须

重新发掘。在历史的长河中,非洲人民和居住在非洲大陆以外的人们,在各种形式的交往中,彼此互相接近,直到逐渐相识。处身非洲以外的古老民族,最初可以在远离非洲的地方,接触到各种来自非洲的物产,听取光怪陆离、娓娓动人的非洲见闻,他们慢慢也想方设法去亲历非洲的土地,或者从海上,或者从陆上、水陆兼程来到非洲。而非洲的居民远离本土云游四方,也使非洲的声名得以远播。所有这些,便构成了非洲和旧大陆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交往的历史。

非洲历史的再认识,也包括非洲和它以外的亚洲、欧洲以及美洲的许多民族彼此联系、彼此认识的历史,它们构成了丰富多彩的非洲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类进入文明的历史,也就是说,摆脱了低级的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奴隶主统治的国家以后,非洲和旧世界的交往,特别是和亚洲的联系显著的加强了。首先是光辉灿烂的埃及古文化的世界性扩展,引起了亚、非民族之间最初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交往。从此以后,除了红海两岸埃塞俄比亚高原和阿拉伯半岛南部山地之间,在地质年代曾经相接而在人类生活的时代仅有一水之隔之外,西奈半岛就成为西亚和东北非洲之间最方便的通道。海克索斯人、斐里斯丁人、希伯来人、腓尼基人、亚述人和波斯人、希腊人,在公元前都从这里拥向尼罗河流域的肥沃谷地。他们有资格称为最先接触非洲的域外民族。但是直到公元前 500 年左右,波斯的大流士将他的统治区扩大到欧洲的色雷斯和马其顿、非洲的埃及,建立起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将它的领土把尼罗河和印度河谷联成一片。不到两个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吞并了伯罗奔尼撒,之后,在公元前 322 年,重又建立起版图和大流士相仿的帝国,尼罗河和印度河、锡尔河再次成为一个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帝国尽管昙花一现,按照它的自然境域分裂为三,但是一种加强亚非大陆和地中海世界联系的努力,已不再是一种愿望,而变成为一股潜在的巨大力量了。

在中国和非洲之间的一片广阔的地区中,葱岭是黄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交通的一座天然屏障,天山和昆仑山脉由此向东北和东南伸展出去,但古代的游牧民族征服了它,使它未能阻挡古代人类的交往,而偏偏成了中亚交通的重要孔道。中国应该很早就已接触到非洲的事物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各种宝石和珍贵香料。从它们最初所赋予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名称中可以推想,由于它们来自难以想象的远方,要闯过重重难关,历尽艰辛,经过许多民族的转手,才能到达中国,所以当初中国人很难确认它们来自什么地方,而只能约略指出一个方向。

只要举出一个粗略的数字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在雄心勃勃的罗马人登上历史舞台以前,中国对于非洲的知识是这样的贫乏。因为从中国古代政治和经济中心的渭水流域到尼罗河三角洲之间的直线距离,超过 6500 公里,比之恒河三角洲和尼罗河下游的陆上距离还要遥远。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在古代文明世界中,中国

和非洲的直接交往竟开始得这么迟缓!

中国在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 年~前 221 年)就开始摆脱奴隶制的羁束,走上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道路。在公元前 221 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统一帝国,使它对西方的商业和交通能够以新的规模展开。汉帝国(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和罗马帝国(公元前 146 年~公元 395 年)开始要求直接建立商业往来,叙利亚和南阿拉伯就此成为中国和埃及、利凡特进行大规模丝绸和黄金贸易的跳板。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航海民族,可以无愧地列入世界最优秀的航海民族的行列。虽然中国开始经营印度洋航业,同样由于地理上的原因,比之印度洋沿岸民族,在时间的追溯上有所逊色。但是由于有了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拥有精湛的远洋帆船,所以在罗马人称霸红海的时代,中国帆船便已开始远航亚丁湾了。这种交往,使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沿岸的居民和风土有了新的知识,为中国和非洲的直接交往开辟了新的充满着希望和活力的道路。从此以后,中国一直在寻求通过水上交通和非洲建立直接的交往。同样的理想,在许多沿海的非洲民族身上滋长出嫩芽,茁壮成长。

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中国帆船在 7 世纪以后已经开航桑给海岸。中国和非洲之间的直接贸易从此得以持续发展,所以中国文献竟比阿拉伯文书还要早的记载了索马里人曾经派出使者到达中国。10 世纪以后,中非贸易蒸蒸日上,非洲对于中国,已不再是神秘的大陆。中国帆船在长时期中起着中非交通的纽带作用。中国的海外贸易商人,追踪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足迹,遍历东非和北非洲,甚至知道了尼日尔河西岸有个奇妙的黄金国。

到了 15 世纪上半叶,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船队七次成批访问印度洋,多次到达东非各地,深入到坦桑尼亚沿岸,甚至越过了莫桑比克海峡,进入大西洋。七下西洋的盛举,已成历史的美谈。虽则一些西方的学者违反历史发展的现实,喜欢把它说成是中国和非洲海岸确立直接交通的开始,实则不过是已经历时几个世纪的中国印度洋航业的最后的一出杰作而已。那时的中国,曾是印度洋航行界煊赫一时的主角。15 世纪末,达·伽马绕过非洲南部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后来便是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势力入侵非洲大陆,从此非洲进入了多灾多难的近现代。

中国,这个占据着亚洲文明世界三分之一地方的大国,虽然地处亚洲的东部,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是和非洲有过广泛联系的重要国家。在和非洲交往的许多国家中,中国人虽然没有成为最早参加者的荣幸,却是在悠久的岁月中,冲破了最遥远的间隔和重重阻难,以惊人的毅力和卓越的智慧维系着和非洲人民的忠实友谊的民族。

中国对于促进非洲和外界的联系是有过贡献的。但很多事实长期暧昧不明,许多英雄壮举早已销声匿迹。中国和非洲友好往来的历史,遭到歪曲、阉割和抹

煞。历史的全貌有待于人们重新发现,就像当初中国人参加远征非洲的队商或航船那样,需要远涉重洋,穿越惊涛骇浪,冲过沙漠风暴,攀登层峦叠谷,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照浴在海滨烈日之下,蕴含着奇丽的珠宝、满布香木和犀象出没的非洲大陆。

让我们循着前人的足迹去涉猎这块历史的园地吧!

对这段历史的阐释,将使旧大陆东西两端居民以往的接触,增添许多尚未为人称道的篇章。